

# 张家口市博物馆藏龙纹铜器座的时代及相关问题

杨 洁

(河北博物院)

(关键词) 龙纹铜器座 元代 铜蹲龙座 舆辂制度

(内容提要) 张家口市博物馆藏 1 件方形龙纹铜器座, 展牌信息为龙纹旗杆铜座, 时代辽金, 出土地点不明。通过对器身标签辨识、文献资料梳理、考古材料比对等, 确认其准确命名为铜蹲龙座, 时代为元代, 出土地点为沽源县小宏城遗址, 推测其为元代皇帝大辇上的装饰物。小宏城遗址经考证为元代察罕脑儿行宫, 该件铜蹲龙座的发现进一步印证其皇家行宫性质。元代铜蹲龙座是首次发现的元代铜蹲龙附属实物标本, 对元代皇家用器、舆辂制度、两都巡行路线等研究有重要价值。

(中图分类号) K871.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483(2024)03-0097-07

DOI:10.16422/j.cnki.1001-0483.2024.03.006

**Key words:** Dragon Pattern Bronze Seat Yuan Dynasty Squatting Dragon - Shaped Bronze Seat Seat Yulu System ( Rules and Regulations for the Chariots Royalty)

**Abstract:** Zhangjiakou City Museum collects a square dragon - shaped bronze seat , the exhibition label information for the dragon - shaped flagpole bronze seat , the era of the Liao and Jin dynasties , the excavation site is unknown. Through the body label identification , literature research , archaeological material comparison , etc. , it is confirmed to be accurately named as a "Bronze Squatting Dragon Seat" , dating to the Yuan dynasty , excavated from the Xiaohongcheng site in Guyuan County. It is speculated to be a decorative item from the emperor's chariot of the Yuan Dynasty. The Xiaohongcheng Site has been verified to be the Chahannaer palace in the Yuan Dynasty. the discovery of the bronze squatting dragon seat to further confirm its royal palace nature. Yuan dynasty bronze squatting dragon seat is the first discovery of the Yuan dynasty bronze squatting dragon - on annexed to the physical specimens , providing significant value for research on the Yuan Dynasty royal utensils , the Yulu system , and the patrol routes of the two capitals.

2023 年 2 月 21 日, 河北省张家口市博物馆新馆完成布展并对外开放, 博物馆通过 4 个展厅, 全面展现了张家口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在《张家口古代历史专题陈列》展厅辽金元部分, 摆放着 1 件方形龙纹铜器座, 展牌信息标识器物名称为龙纹旗杆铜座, 时代辽金, 即策展人认为该件器物为辽金时期的旗杆座。经笔者辨识与考证, 该件器物的准确命名应为铜蹲龙座, 时代为元代。这件龙纹铜器座是国内首次发现的元代铜蹲龙座实物, 对研究元代官式青铜器铸造、皇家用器、舆辂制度等有重要价值, 现将相关考证依据分述如下。

## 一、出土地点与时代

关于龙纹铜器座的出土地点, 通过查阅张家口市博物馆文物入藏档案, 显示为 1980 年沽源县宏城遗址征集。在龙纹铜器座器身一角贴有标签, 上写“沽沅红城遗址灯座”。通过该两条信息, 可以确认龙纹铜器座出土于沽源县宏城遗址或红城遗址。查阅沽源县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资料可知, 沽源县并无宏城遗址或红城遗址, 但有大宏城遗址和小宏城遗址。

大宏城遗址位于沽源县闪电河乡大宏城村西南 750 米处, 南 500 米为囡囡淖, 东南 1000 米为王

老大营子,西南1500米为田家营,地理位置为东经115°43.207′,北纬41°43.905′,海拔1411米。遗址为一处古代城址,平面呈方形,边长135米,方向10°。城墙北、南、西城垣保存基本完好,底宽15~17、顶宽2~3、高1.5~2.2米,东城垣南侧有一豁口,推测为东城门所在地。城内地势较平整,无凸出地表的土台,地表散落大量泥质灰陶绳纹筒板瓦、泥质灰陶弦纹罐、夹砂灰陶绳纹瓮等建筑构件和陶器残片,遗物时代均为汉代。根据大宏城遗址遗存情况判断,城址时代为汉代,性质推测与军事有关。

小宏城又称小红城、乌兰城,“乌兰”蒙语“红”,即“红城”之意。遗址位于闪电河乡小宏城村北,西邻024乡道,东500米为闪电河,西南2400米为大宏城遗址,地理位置为东经115°44.862′,北纬41°44.352′,海拔1398米。遗址为一处古代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360、东西长330米。城墙北、东、西城垣保存较好,南城墙大部被村民建房或耕地破坏,在东、南、西城垣的中部各有一城门,其中南门为正门。城内考古钻探共确认建筑基址12座,中心部位为1座“工”字殿,其他11座建筑基址沿轴线围绕中心大殿分布。遗址地表发现汉白玉螭首、汉白玉柱础、黄绿琉璃瓦等高等级建筑构件,另出土枢府瓷高足杯、“内府”款梅瓶、钧釉碗、黑釉鸡腿瓶等瓷器残片。1978年,当地居民在城址东南部建房时,曾出土“至元八年”款铁权。根据地表采集和出土遗物可确认,小宏城遗址时代为元代。

关于小宏城遗址的性质,已有郑绍宗<sup>①</sup>、尹自先<sup>②</sup>、郭郭<sup>③</sup>、叶新民<sup>④</sup>、党宝海<sup>⑤</sup>等进行过论证,其为元代两都巡行路上的重要行宫——察罕脑儿行宫,亦称白海行宫、西凉亭,此不赘述。察罕脑儿行宫的始建和废弃年代在文献中有明确记载,据《元史》:“至元十七年五月甲辰,作行宫于察罕脑儿。”<sup>⑥</sup>《明史》:“洪武三年二月,李文忠下兴和,进兵察罕脑儿,执元平章竹贞。”<sup>⑦</sup>故察罕脑儿作为有城池的行宫使用时间为1280—1370年。

从以上对大宏城和小宏城遗址的叙述和对比可知,大宏城遗址时代为汉代,与龙纹铜器座的造型和纹饰不符,该龙纹铜器座的出土地点应为沽源县小宏城遗址。龙纹铜器座器身龙纹布局,与汪世显家族墓1号元代墓出土的至元四年(1267年)铜镜<sup>⑧</sup>、故宫博物院藏元代双龙纹镜<sup>⑨</sup>背面的纹饰相同,肩部重瓣覆莲纹与汪世显家族墓22号元代墓出土的鎏银铜盒盒盖重瓣覆莲纹<sup>⑩</sup>、银盒盒盖覆莲纹<sup>⑪</sup>相似,故可确认龙纹铜器座的年代为元代。

## 二、龙纹铜器座性质

龙纹铜器座基本完整,整体为方形中空,从上到下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顶部。由上突子口、环形座和方形平板组成,子口方唇直壁,一侧被挤压内凹,直壁上有4个圆形小穿孔;环形座素面外突,上承子口,下接方形平板;方形平板中心为圆孔,外围饰16枚重瓣覆莲纹,其中,四角部分的莲瓣个体较大,下层莲瓣尖部有纵向凸线纹,上层莲瓣尖部内凹上翘,瓣身凸起,每组饰3枚卷草纹。第二部分,肩部。四面各有一组方形凸棱围合的梯形开光,开光之间用4组连珠纹间隔,每组连珠纹由6颗外突圆珠组成。各梯形开光内印兽面纹,图案相同。兽面整体微上凸,椭圆形双眼,卷云纹眉,窄竖三角形鼻,阔嘴,嘴角内卷,额头中心为圆形宝珠,两侧为卷叶形身体,下为回形地纹。第三部分,身部。四面纹饰相同,均方形开光下凹。中心部位饰圆形二龙戏珠纹,龙均五爪,左下和右上双龙头对峙,中心为圆形宝珠,外围回纹做地。每面方形开光下饰两组并列卷草纹,外围用宽凸线纹分界。器内光素无纹,粘有少量白灰。青铜质,铸造。通高30.4、上口径10、底边长26.4、壁厚0.8厘米,重11.35千克(图一;图二)。

河北崇礼太子城遗址在2019年考古发掘中,曾出土与本文龙纹铜器座器物形制和纹饰相似器物。太子城遗址铜坐龙器座,编号19CTJ2:1,完整。由碗形部分和方形器座组成,碗形部分中空,厚方唇,深圆曲腹,高圈足。方形器座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顶部,整体为一方形平板,中心为素面上突环形座,外围满饰回形地纹,内侧四角各饰卷云纹1朵;第二部分,肩部,四面满饰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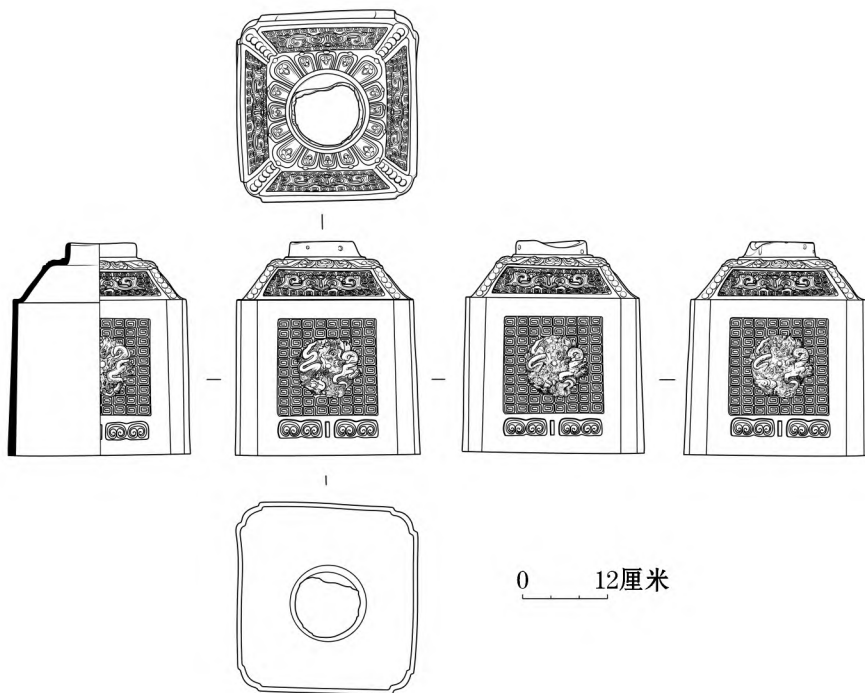


图一 张家口市博物馆藏龙纹铜器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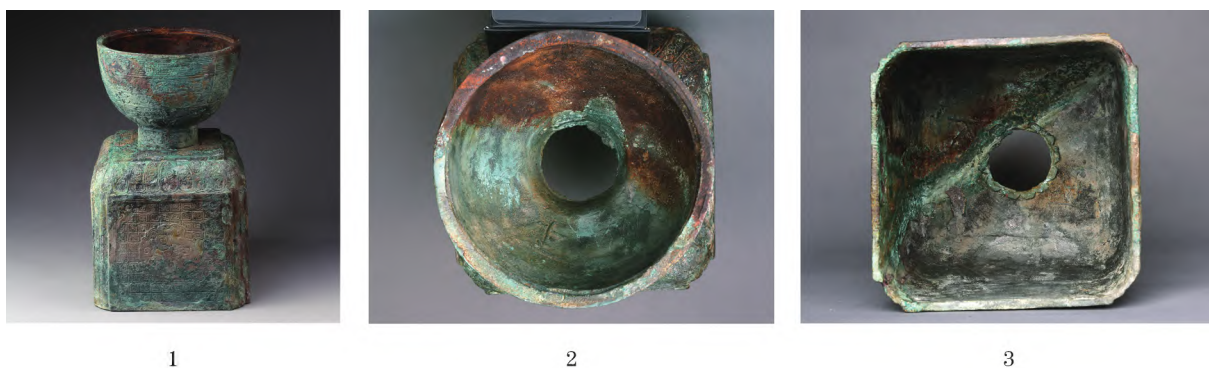
1. 正视 2. 侧视 3. 顶视 4. 器内

层覆莲纹，每面9瓣，中心一组直立，两侧微外弧，每朵莲瓣内饰花叶纹1枝；第三部分，身部，四面纹饰相同，均方形开光，中心部位饰圆形云龙纹，外围回纹做地，四角各有卷云纹1朵。器外纹饰均为阳纹，青铜质，铸造。通高27.4、上口径15、底边长16.9、壁厚0.3~0.5厘米，重6.29千克<sup>⑫</sup>（图三；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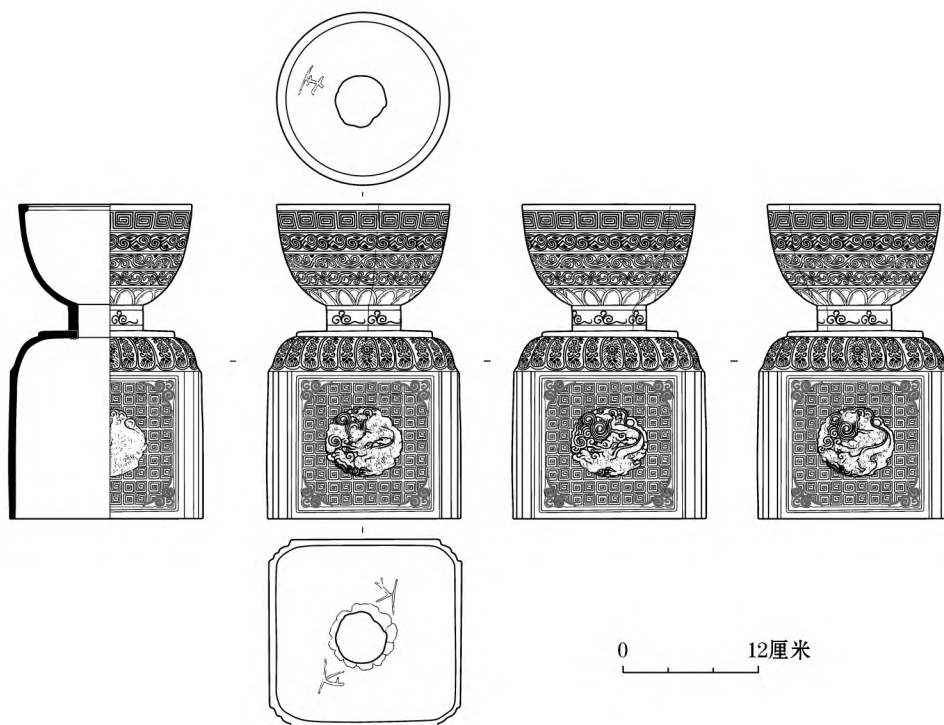
通过对比可知，张家口市博物馆藏龙纹铜器座与崇礼太子城遗址出土的铜坐龙



图二 张家口市博物馆藏龙纹铜器座线图



图三 太子城遗址出土铜坐龙器座  
1. 正视 2. 顶视 3. 器内



图四 太子城遗址出土铜坐龙器座线图

器座下半部器物形制完全相同，主体纹饰相似，只是遗失了碗形部分。另通过对这 2 件铜器座的科技检测可知，太子城铜坐龙器座成分约为：铜 80.3%、锡 11.4%、铅 8.2%，馆藏龙纹铜器座成分约为：铜 72.3%、锡 12.5%、铅 12.7%，二者成分相似，均为青铜器。由上可知，张家口市博物馆馆藏龙纹铜器座的性质，应与太子城遗址出土的金代铜坐龙器座相同。

### 三、准确名称

关于龙纹铜器座的命名，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可知，元代并无“铜坐龙”这一名称，但多处文献中有“蹲龙”的记载。《元史·舆服志一》：“玉辂，青质，金装，青绿藻井，栲栳轮盖。外施金装雕木云龙，内盘碾玉福海圆龙一，顶上匝以金涂鍮石耀叶八十一……顶轮衣三重，上二重青绣云龙瑞草，下一重无文。轮衣内黄屋一，黄素纒丝沥水，下周垂朱丝结网，青纒丝绣小带四十八，带头

缀金涂小铜铃，青纆丝绣络带二。顶轮平素，面夹用青纆丝……勾阑上玉行龙十，碾玉蹲龙十……前辕引手玉螭头三，并系以蹲龙。后辕方罨头三，栳头十六，纆以蹲龙三……舆之轴一，轮二。轴之拏罗二，明辖蹲龙纆，并青漆。”<sup>⑬</sup>另在金辂、象辂、革辂、木辂的勾阑、前辕、后辕、明辖上均有相同记载，只是在勾阑和前辕部分的蹲龙质地不同：金辂为金涂鍮石、象辂为描金象牙雕、革辂为描金白檀、木辂为金嵌镔铁。

“蹲龙”一词最早出现在南宋时期，《宋史·舆服志一》：“绍兴十二年，始命工部尚书莫将、户部侍郎张澄等以天禧、宣和卤簿图考究制度，及故内侍工匠省记指说，参酌制度……（玉辂）阑柱头有玉蹲龙……（御座）下有涂金蹲龙十六。”<sup>⑭</sup>《明史·舆服志一》：“大辂，高一丈三尺九寸五分，广八尺二寸五分……辂顶并圆盘高三尺有奇，镀金铜蹲龙顶，带仰覆莲座，垂攀顶黄线圆条。”<sup>⑮</sup>《清史稿·舆服志一》中“蹲龙”的相关记载<sup>⑯</sup>与《明史》基本相同。“坐龙”的最早记载出现于北宋时期，《宋史·舆服志一》载“太祖建隆四年，翰林学士承旨陶谷为礼仪使，创意造为大辇：赤质，正方，油画，金涂银叶，龙凤装……四角龙头衔香囊，顶轮施耀叶。中有银莲花坐龙。”<sup>⑰</sup>《金史·舆服志上》“天子车辂”条中“大辇”的记载<sup>⑱</sup>与《宋史》基本相同。

通过对文献中“蹲龙”和“坐龙”记载的梳理可知，“坐龙”一词源于北宋，北宋、金时期称坐龙，南宋、元、明、清时期称蹲龙，主要安放在皇帝辇辂各部位以示皇威，故此件龙纹铜器座的准确命名应为元代铜蹲龙座。

#### 四、其他铜器座

目前，考古发掘和收藏的铜坐龙或蹲龙器座，除上文提到小宏城遗址及太子城遗址出土的2件外，另有以下2件。

北京房山金陵遗址出土的铜坐龙及器座，编号2001FJLP3:3，坐龙头上扬，口微张，弓身蹲坐，肩前弓附云纹两翼。前腿直立，后腿曲踞后向前平伸，尾上翘，端部残，高18厘米<sup>⑲</sup>。该件坐龙在2001年出土时未有器座，后在2012年7月22日的北京房山大雨中，冲出了坐龙器座。器座呈碗形中空台座，台面为圆形铜片，上有3个圆形穿孔与坐龙的双前爪和臀部对应，铜片上印有花纹但已漫漶不清。台座侧面为5组环形纹饰带，自上而下分别为：一圈回纹、三圈卷草纹、一圈重瓣仰莲纹，底端管状，端部残断。台座直径13.5、残高10.3厘米<sup>⑳</sup>（图五）。

黑龙江阿城区发现收藏的铜坐龙及器座，坐龙整体昂首张口，弓身蹲坐，单股尾上翘。肩生双翼，左前腿直立，右前腿抬起，爪踏祥云，祥云与右后腿相连。双后腿曲踞呈直角，端部爪突出。坐龙下接碗形中空台座，台面饰水波纹，侧面为5组环形纹饰带，自上而下为：一圈回纹、三圈卷



图五 北京金陵遗址出土铜坐龙及器座

1. 正视 2. 器座侧视 3. 器座顶视



图六 黑龙江阿城发现收藏铜坐龙及器座



图七 太子城遗址出土铜坐龙及器座

草纹、一圈仰莲纹，底端管状。坐龙高 19.5、正面宽 5.5、侧面宽 17 厘米，台座台面直径 14、底径 4.5、高 10.5 厘米，总重 3.2 千克<sup>①</sup>（图六）。

由上可知，目前考古发掘或收藏的铜坐龙或蹲龙座共 4 件，其中金代 3 件，分别为太子城遗址 1 件、北京金陵遗址 1 件、黑龙江阿城区发现收藏 1 件；元代 1 件，即本文所述小宏城遗址器座。4 件器座中，太子城遗址器物形制完整，另附有坐龙（图七），北京金陵遗址出土和黑龙江阿城发现收藏的均只有器座上部碗形部分，小宏城遗址器座只有下部方座。小宏城遗址出土龙纹铜器座是首次发现的元代铜蹲龙座，也是目前发现的第二件完整铜方座，对金元时期官式手工业制度研究有重要价值。

广义的坐龙，包括一切呈蹲坐状的龙，质地有玉、铜、木、陶等。狭义的坐龙，特指自北宋至清代安放于皇帝舆辂各部位，或勾阑、帐、经藏柱、景钟架等柱首的装饰物，质地亦有铜、木、鎏石、象牙、白檀、镔铁等。广义的坐龙按功能基本可分为三类：第一类，镇墓或镇宅，有去凶辟邪之含义，如甘肃敦煌佛爷庙湾墓群第 121 号墓出土的龙首犬身怪兽<sup>②</sup>、北京史思明墓出土铜坐龙<sup>③</sup>、西安元代张达夫及其夫人墓出土陶龙<sup>④</sup>、敦煌文书法藏《宅经》中的伏龙<sup>⑤</sup>等；第二类，彰显威严，安放于皇帝舆辂各部位或勾阑、望柱等柱首，主要指上文所述狭义的坐龙；第三类为供奉，多出土于佛教的寺院和塔基中，如辽宁朝阳北塔天宫出土玉坐龙<sup>⑥</sup>、江苏江阴泗州大圣塔出土银坐龙<sup>⑦</sup>等。狭义的坐龙中，目前共发现铜坐龙 10 件，其中，金上京遗址 2 件、金中都遗址 2 件、金陵遗址 4 件、太子城遗址 2 件，均出土于金代的都城、皇陵或皇家行宫，此次发现的元代铜蹲龙座同样发现于元代的皇家行宫，进一步印证金元铜坐龙或蹲龙的皇家属性。

张家口市博物馆藏龙纹铜器座的时代为元代，名称为铜蹲龙座，出土地点为河北省张家口市沽源县小宏城遗址，功能应为皇帝大辇上的装饰物。该龙纹铜器座是首次发现并经确认的元代铜蹲龙座实物，也是继金代太子城遗址铜坐龙器座后，发现的第二件完整的铜蹲龙方座，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铜蹲龙座器外满饰重瓣覆莲纹、兽面纹、连珠纹、云龙纹、回纹、卷云纹等，装饰繁缛华丽，彰显了元代官式器物的审美特征，应为皇家专属定制产品。元代铜蹲龙座的发现，体现了元代对宋金皇家舆辂制度的继承、发展与创新，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实物标本，为元代皇家用器、贡御制度、手工业制度、宋至清代的舆辂制度等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定窑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项目编号: 22&ZD245)、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河北崇礼太子城金代行宫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 22BKG025)、“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 2021M700030)阶段性成果。

附记: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崔剑锋对龙纹铜器座进行了科技成分检测,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李永强、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阳等提供了铜坐龙相关资料, 北京房山金陵铜坐龙及器座照片由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周紫薇拍摄, 太子城遗址铜坐龙和器座照片由河北博物院郝建文拍摄, 张家口市博物馆姚玉柱为龙纹铜器座的科技检测、照相、绘图等工作提供大力支持, 在此谨致谢忱!

### 注 释:

- ① 郑绍宗 《考古学上所见之元察罕脑儿行宫》,《历史地理》(第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 ② 尹自先 《元代察罕脑儿行宫及明安驿故址考辨》,《张北高原历史文化研究文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139—1146页。
- ③ 郭鄂 《元察罕脑儿行宫实地考辨》,《文物春秋》1993年第2期。
- ④ 叶新民 《元上都的凉亭》,《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 ⑤ 党宝海 《察罕脑儿行宫与蒙古皇室的鹰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 ⑥ 《元史》卷11《世祖八》,中华书局1976年,下同,第224页。
- ⑦ 《明史》卷2《太祖二》,中华书局1974年,下同,第23页。
- ⑧ 甘肃省博物馆、漳县文化馆 《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葬》,《文物》1982年第2期。
- ⑨ 故宫博物院编,何林主编 《故宫藏镜》,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第160页。
- ⑩⑪ 甘肃省博物馆编,俄军主编 《汪世显家族墓出土文物研究》,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第148页;第156页。
- ⑫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河北崇礼太子城遗址出土金代铜坐龙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23年第5期。
- ⑬ 《元史》卷78《舆服志一》,第1944—1945页。
- ⑭⑰ 《宋史》卷149《舆服志一》,中华书局1977年,第3484页;第3486页。
- ⑮ 《明史》卷65《舆服志一》,第1599—1600页。
- ⑯ 《清史稿》卷102《舆服志一》,中华书局1977年,第3015—3023页。
- ⑰ 《金史》卷43《舆服志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971页。
- ⑱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 《北京金代皇陵》,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01页。
- ⑳ 铜坐龙器座数据由北京市考古研究院李永强提供。此件铜坐龙现收藏于首都博物馆,器座现收藏于北京市房山区文物保护单位。
- ㉑ 孟祥华、关伯阳 《金源文物的惊世发现》,《东北史研究》2010年第4期。
- ㉒ 戴春阳 《敦煌佛爷庙湾唐代模印塑像砖墓(五)——模印龙首犬身怪兽砖与有关问题》,《敦煌研究》2020年第4期。
- ㉓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文物》1991年第9期。
- ㉔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西安曲江元代张达夫及其夫人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8期。
- ㉕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2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4页。
- ㉖ 朝阳北塔考古勘察队 《辽宁朝阳北塔天宫地宫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第7期。
- ㉗ 陆建芳、唐汉章、高振卫 《江苏江阴发掘北宋泗州大圣宝塔塔基》,《中国文物报》2004年4月30日第1版。

(责任编辑 阴美琳)